



日本學

第十三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

日本学

第十三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 涛
封面设计：边 疆
责任出版：唐 萍
责任校对：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学：第 13 辑 /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

ISBN 7-5012-2804-3

I . 日 ... II . 北 ... III . 日本 - 研究 - 文集
IV . K313. 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101 号

日本学(第十三辑)

Ribenxue (Dishisanji)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网址：<http://www.wap1934.com>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照排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1/2 字数：346 千

2006 年 3 月第一版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5012-2804-3/D · 579 定价：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学》。

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确切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

日本学的定义、内涵，乃至其能否构成一个学科，人们意见未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本学》的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

《日本学》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人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7、8世纪靺鞨与古代日本

- 对日贸易与移民的尝试 马一虹(1)
赖山阳的史学思想试论 赵建民(17)
近世长崎文化及其影响

——国际多元文化地区的形成过程

- [日]越中哲也 小圆晃司(34)
幕末动荡社会中的信仰 [日]宫崎史子(49)
江户时代的银座 周爱萍(65)
二退二进——日本明治初年留学政策初探 胡连成(80)
略论明治20年代(1887—1896)的政教社国粹主义 戴宇(95)
横滨近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状况浅析

- 张晓刚 刘毅(108)
对1896年《山县—罗拔诺夫协定》的若干考察

- [日]福田忠之(124)
晚清留日学生报刊与中日关系 徐志民(141)

“9·18”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 曾景忠(156)
日本战时“国家母性主义”妇女观 胡澎(172)
1929—1937年青岛城市经济中的日资初探 姜忻(186)
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述论 徐勇(193)
略论战后初期朝鲜南部的“战后处理” 安成日(205)
战后日本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 纪廷许(219)

中曾根与“新京都学派”

—— 20世纪 80 年代日本文化的新国家主义

..... 孙 政 (238)

日本百科辞书的发展及其源流 潘 钧 (254)

探求日本军国主义源流之五视点 [日]星野芳郎 (267)

日本出版业的现状分析 诸葛蔚东 (280)

日本的海洋战略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修 斌 (295)

明治维新与日本史学 [日]永原庆二 (307)

南开园里 耕耘不已

—— 读《躬耕集》 宋成有 (324)

一部珍贵的必读之作

—— 评《中国学者的日本古代史论》 [日]古田武彦 (334)

开拓日本近世史研究的新视野

—— 评《德川时代史论》 陈奉林 (351)

锐意进取 贵在创新

—— 《町人伦理思想研究》读后感 杨宁一 (358)

《扶桑游记》所塑造的日本形象 王立群 (367)

第一部日台关系史研究专著

—— 评《战后日台关系史》 宋云伟 (382)

近世武士道研究在日本

—— 日本历史特殊性与连续性的探求 唐利国 (388)

执著推进森田疗法及其中日交流的冈本常男先生

..... 贾蕙萱 康成俊 (404)

热心中日文化交流的香港青年企业家

—— 记林健忠先生 张可喜 (412)

7、8世纪靺鞨与古代日本 ——对日贸易与移民的尝试

马一虹

2万年前，日本列岛与东北亚大陆还是一个整体。约1.7万年前津轻海峡形成，约1.2万年前宗谷海峡形成，而鞑靼海峡则是数千年前才使库页岛与亚洲大陆分离。北海道隔日本海与东北亚大陆相望，北端的宗谷海峡（拉彼鲁兹海峡）与库页岛南端的西能登吕海峡之间只有42千米，而库页岛与黑龙江下游东海岸与鞑靼海峡（间宫海峡）间最短距离只有7千米，冬季来临，流冰会将海峡完全埋没，交通极为便利。^① 在如此一衣带水的北海道、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地区之间，通过古代部族的移动或活动，大陆文化从黑龙江下游、库页岛传入北海道地区，对北海道的传统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20世纪以来考古学研究显示，至迟到公元6世纪以后^②，黑龙江沿岸、库页岛及日本北海道地区，存在过由大陆向日本北海道鄂霍次克海沿岸为主地区的人员流动与文化输出的迹象。^③ 而这时，在我国东北，正是靺鞨人最为活跃的时期。

靺鞨，是6世纪中叶至10世纪间主要活跃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及滨海地区，以及包括库页岛等地区在内的一个古代部族。长期两属于隋唐王朝和高句丽。668

^① 参见菊池俊彦：《北海道地区北方诸民族的交流》，载《新版古代日本 东北·北海道》，角川书店1992年版，第372页。

^② 目前，各国考古学界对黑龙江中下游靺鞨遗迹的年代上限认识不一，苏联学者认为是4—8世纪，日本近年研究则提出其形成期可能要迟至6世纪。

^③ 参见菊池俊彦，《东北亚古代文化的研究》，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1995年版。

年，高句丽在唐朝与新罗的联合打击下灭亡，这一事件引发了东北亚大陆各古代部族的移动与重组：渤海建国。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渤海领土扩张政策的实施，靠近渤海的拂涅、铁利、挹娄、越喜等部陆续被迫役属渤海，并最终被吞并，成为渤海国的一部分。黑水部也逐步向黑龙江下游退却。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有些小规模的人群集团逃向黑水部领域，或更加远离渤海势力的地方，以求自存。^① 日本方面的史料披露了他们移民日本的尝试。

一、7世纪靺鞨与日本——北海道 及东北地区的贸易与冲突

靺鞨部族与日本古代国家的直接交流关系可能发生于7世纪，即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阿倍比罗夫远征时期。

《日本书纪》载，齐明四年（公元658年）至六年（660年），倭派遣越国（今日本北陆地区。在倭及律令国家阶段在外交方面为连接朝鲜半岛、大陆与日本的重要窗口）阿倍比罗夫率领水军远征虾夷。史籍在记述该段历史时，有四处涉及讨伐“肃慎”。关于“肃慎”的所在地区及其属性，日本学界早有讨论，但至今仍认识不一。一种看法认为属通古斯，即肃慎——靺鞨说^②，一种看法主张属北海道地区的鄂霍茨克文化人^③，后一种认识近年在日本影响较大。

从结论上说，我推测，此处的“肃慎”属于大陆北方靺鞨系统人群集团的可能性更大。齐明年间发生的上述事件反映的是靺鞨人与日本列岛贸易交流开始阶段的情况。他们很可能是以窟说部和莫曳皆部为主、生活在黑龙江沿岸及库页岛上的靺鞨人集团，也可能居住在绥芬河流域附近的虞娄等所谓（东）南部靺鞨人集团。⁶

① 马一虹：《8世纪中期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考》，《文史哲》2001年第6期。

② 最早见于白鸟库吉：《肃慎考》，载《历史地理》第17卷第1号，1921年。

③ 瓦岛荣纪：《古代北海道的“肃慎”与“虾夷”》，载《历史评论》1995年，第28—39页。

世纪中期，就有“肃慎人”到过位于北陆地区的佐渡岛，“春夏捕鱼充食”^①。渤海国时代，绥芬河附近设有渤海五京之一的东京龙原府和率宾府，是对日本交流的重要窗口。以下具体讨论。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表明，北海道南部、中心部与本州东北部地区存在着密切交流，两地文化的相似性很大。其背景，则是以阿倍比罗夫的北征等行动为代表的、7世纪以后日本倭王权及律令国家对北方的介入和经营。^② 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日本古代国家对生活在北海道的渡岛虾夷已经熟悉，并且已经具有相当的支配力，而与渡岛虾夷同时出现的“肃慎”，具有海民色彩，语言不同，举动特异。总之，在当时日本人眼中，仍然是完全不同于渡岛虾夷的陌生异邦人印象。

从钦明年间540—571年记事看，佐渡岛的“肃慎”似乎并不是该地的定居人群，外来的色彩比较浓厚。另一方面，渡岛虾夷人对这些“肃慎”人似乎并不很陌生，但是显然属敌对关系，而且没有更多的直接对话与交流，尽管已有了沉默交易。在当时日本人看来，海洋部族“肃慎”并非长期、固定地生活在北海道，他们是不同于北海道原住民的异域人，但很可能在该地区拥有居留地，与相邻的虾夷人保持着贸易联系，但关系似乎并不友好，时有争端发生。

由上不难看出，古代日本正史中所描述的“肃慎”人，是与北海道的虾夷人不同的异质文化的承载者。因此，他们当来自于北方即欧亚大陆的可能性很高。而按照史料提示的“肃慎”人的特征来看，他们更可能是靺鞨文化人。

古代日本对“肃慎”的认知来自中国的古史记载，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日本就必然首先对中国史籍中“肃慎”的分布地域、身体特征和各种习俗有所了解，然后才有可能在这种认识的

^① 《日本书·钦明纪》(卷一九)钦明五年十二月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新装版，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91—92页。

^② 斋岛荣纪：《阿倍比罗夫的北航与东北亚地域》，《古代国家与北方社会》，吉川弘文馆2001年版，第86页。

基础上,对与肃慎人的诸种特征相类似的人群集团(如鄂霍次克文化人)也称为“肃慎”。换句话说,古代日本所认识的“肃慎”,应当同时兼含中国史籍中肃慎部族的分布地区和后来的鄂霍次克文化地区。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肃慎”人的所属提出正确的、更接近事实的推定。

《日本书纪》曾记载“肃慎七人,从清平等至之”。显然,这七名“肃慎”人来自大陆。当然,彼时的肃慎在7世纪已被称做靺鞨,而当时靺鞨的确与新罗保持着密切关系。高句丽灭亡前,是高句丽控制或影响着靺鞨各部,高句丽灭亡后渤海建国之前,是新罗控制着主要是南部的靺鞨人集团如粟末靺鞨、白山靺鞨,可能还影响到了居于其北面的绥芬河出海口附近的拂涅靺鞨、越喜靺鞨等部。

“肃慎”即靺鞨人是跟随新罗使节来到日本的。这一部分靺鞨所属的部族集团当时很可能是臣属于新罗的。新罗在派遣使节到日本带上七名靺鞨人,有可能意在向日本表明本国的政治立场,以对抗日本的大国意识。^①日本对新罗来使称“请政”,对新罗携来的贸易品视为义务即“调”。而新罗带上这七人,很可能也与日本在派遣遣唐使时带上两名虾夷人的目的如出一辙^②,即试图对君临天下的唐朝皇帝婉转、微弱地强调其对等立场。特别是676年,正是新罗将唐朝军队逐出大同江南岸,事实统一半岛大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新罗当然更加不可能向日本“请政”、“进调”,而其让靺鞨人随行的目的也就更清楚了。

对于跟随新罗使者前来的七名“肃慎”人,新罗一方无疑是非常清楚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不管中间过程如何,从结果上说,日本最终也应会知道随新罗使节前来的这七个人的身份。在“伊吉连博

^① 在《大宝令》中明记新罗是其“蕃国”。虽然此次来朝之事发生时,《大宝令》尚未颁布,但《日本书纪》编纂更在其后,因此,《大宝令》的精神必然渗透其中。

^② 《新唐书·日本传》、《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五年秋七月丙子朔戊寅条载:“遣小锦下坂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下引“伊吉连博德书”中载“……天子曰,此等虾夷国有何方。使人谨答,……每岁,入贡本国之朝(后略)”。

德书”书中，记有大唐天子询问虾夷内部情况的记事，相信日本对于同新罗使节同来的“肃慎”人，也会做类似的身份识别。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书纪》对“肃慎”随新罗来朝的记载，是在叙述完新罗使节来日全过程之后补缀上的，可见日本的统治阶层对此次靺鞨来访也是重视的。日本朝廷把七名靺鞨人、进而将靺鞨部族也视为应对其执臣礼的蕃夷。^①

关于“肃慎”亦即靺鞨人与日本朝廷派出的阿倍比罗夫船队交涉的性质。658年（唐高宗显庆三年）唐发动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唐与朝鲜半岛关系陡然紧张。受此影响，日本派出的遣唐使也因此被迫滞留唐土，不得按期归国。^② 阿倍比罗夫的大船队北航，不排除为倭王权针对大陆紧张局势和使节团被困所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的可能性。但齐明四年、六年记事事实上更可能反映的是两者间的贸易纠葛。《日本书纪》的编撰，是日本朝廷为抬高其在本国和东亚国际地位的一种具体表现。模仿中华帝国的天下秩序，日本也在试图建立以其为中心的“东夷小帝国”^③，对于国际交往中的有关历史事实做出合乎自己政治目的的解释，甚至不惜杜撰和篡改。对此，早有研究者评说在先。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对所谓阿倍比罗夫北征“讨肃慎”一事，就需要批判地分析和认识。

① 参见酒寄雅志：《华夷思想的诸相》，载《亚洲的日本史 V 自意识与相互理解》，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后收入酒寄雅志著《渤海与古代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版，第451—472页。据此，7世纪，乃是日本华夷思想形成时期阶段。也有学者指出新罗人让靺鞨人同行的真正用意在于向日本表明在靺鞨人部族中存在着反唐亲新罗势力。对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唐灭掉高句丽，新罗事实统一朝鲜半岛大部以后，新罗立即着手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与日本则陷入战略上的敌对状态。因为日本是绝对不希望朝鲜半岛结束分裂、走向统一的。新罗将日本在半岛南部设立的殖民地任那府收回，对日本也是不小的刺激。因此，新罗向日本展示靺鞨人中亲新罗势力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打出唐朝牌。不过，不管怎样一种情况，都说明靺鞨人始终是处于东北亚政治变动的漩涡之中的。

② 《日本书纪》（卷二六）齐明五年（659年）引“伊吉连博德书”：“……敕旨，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遂匿西京，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困苦经年”。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39页。

③ 石母田正：《日本古代的国际意识》，载《日本古代国家论》第一部，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319—320页。石上英一：《古代东亚地域与日本》，载《日本社会史》一，岩波书店1987年版，第85—90页。

奈良朝廷为表现对北方地区的君临，而将阿倍比罗夫北航夸大为征讨。可是我们在有关史料中看到，政府军为了引诱“肃慎”人前来，在海边浅滩上堆起綵帛、兵器和铁，当后者如期而至，政府军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耐心等待“肃慎”人挑选货品。以日方 200 艘战船与“肃慎”20 艘船的悬殊对比，日方发起进攻完全不成问题。但上述资料表明，双方交战，并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纯粹是由于交易未果而起。政府（派出军队）如此卖力地招徕“肃慎”人易货，显然他们有更迫切的需求，这种特别的需求很可能就是肃慎、靺鞨人赖以生存的毛皮等物。

《日本书纪》（卷二六）齐明天皇五年是岁条记载了高句丽使者与在日高句丽画师子麻吕使用熊皮待客等事：“又高丽使人，持熊皮一枚，称其价曰，绵六十斤。市司咲而避去。高丽画师子麻吕，设同姓宾于私家日，借官熊皮七十枚而为客席。客等羞怪而退。”这段记事反映出，当时毛皮类是象征着地位与财富的贵重品，并且获取方式还主要依靠大陆方面的输入。因此，阿倍比罗夫（所代表的日本朝廷）对“肃慎”人期待的应该是熊皮、黑貂皮等毛皮。

如果《日本书纪》齐明年间所见献生熊和熊皮的靺鞨人，和后来与阿倍比罗夫水军发生冲突的靺鞨人为同一个集团的话，则他们来自黑龙江沿岸或库页岛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猎熊主要是北部靺鞨人的生业。

北海道地区在当时还是荒蛮之地，没有明确的归属，并没有哪个国家或政权或部族集团对此地行使着垄断的、固定的、有效的管辖。即使是距离上最近的日本古代国家，对包括北海道在内的北方地区的控制力也极为有限。一般而言，7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律令制的确立，日本实施北进政策，其影响也波及到东北和北海道地区，虾夷人开始向律令国家朝贡，但叛附无常。直到 9 世纪，今本州岛北部的秋田、盛冈以南地区才被编入律令体制，成为日本古代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以当时的状况，居住在北海道地区的人群集团，对于日本倭王权或以后的律令国家，还只是一种很松散的接近臣

属的性质。因此，大陆的靺鞨人，无论南、北哪一方，继承其先民的航海传统，南下到北海道地区，以渔捞为生业，并建立起非固定的居留地，都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的行为，颇有些类似于9世纪末黑水靺鞨乘新罗国势衰微而高丽未崛起之机，南下到新罗东北边境附近并建立起据点的情形。^①

综上所述，6、7世纪，靺鞨人与日本列岛的交流可能是从南北两条线展开的，一条线是黑龙江沿岸和库页岛上的靺鞨人部族（大概以黑水靺鞨为主），出黑龙江口，过鞑靼海峡，沿库页岛南下到达北海道；另一条线索则是南部靺鞨人群集团从珲春附近出海，顺锡霍特山沿海航行，然后渡日本海至北海道地区。他们的活动有着恒常的贸易目的，同时又与当时东北亚国家、部族间紧张、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大体在8世纪中叶以后，渤海就已经控制了位于今吉林珲春附近的北线出海到日本的港口^②，并在那里设立了东京龙原府，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和管理该地区。9世纪后，渤海对靺鞨诸部从役使发展到吞并，使许多部成为渤海行政区划的一部分。黑水靺鞨则利用其尚存的实力与靠近黑龙江的地理优势，与渤海形成对峙。与此同时，他们与库页岛上的住民一起，或独立行动，沿着先民开拓的至日本北海道的航线，与北海道的住民结成新的交流网络。

《日本书纪》（卷三〇）持统天皇八年（694年）年正月丁未条载：“以务广肆等位授大唐七人与肃慎二人”。这里的“唐人”，当是渡来日本并已经归化的唐人，“肃慎”，似应为676年随同新罗人来到日本的“肃慎”的同族人。^③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资料可以帮助

^①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一一）宪康王十二年（886年，渤海大玄燁十五年）：“十二年春。北镇奏。狄国人人镇。以片木挂树而归。遂取以献。其木书十五字云。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国和通。”

^② 参见新野直吉：《古代日本与北部海路》，载《芸林》第41卷第1号，1992年，第7页。

^③ 《日本书纪》（卷三〇），持统天皇八年正月丁未条，注释9，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524页。

确认这两位“肃慎”人的身份及到日本的途径,但不排除日本政府将随新罗使同来的靺鞨人扣留在京城的可能性。

二、8世纪的靺鞨与日本——铁利人 的“慕化入朝”及其背景

1.《续日本纪》养老四年记事考辨

《续日本纪》(卷八)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正月丙子条载:“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该条史料记述的是奈良朝廷派遣渡岛的津轻地方的长官带领六名下属前往靺鞨国,考察风土民情。这是日本史籍中关于“靺鞨国”的最早记录。这条记事,作为古代日本北方开发史上的著名事件,近年,随着北方史研究的升温,更被频频提起。不过,关于史料本身,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例如“渡岛津轻津司”,其所在位置至今没有能够确认,但其范围大体当不出日本海西岸偏北一带。

如同前文已经讨论过的,靺鞨人海上航行到日本列岛在此之前早已开始。并且已知当时倭王权和靺鞨部族,已经通过阿倍比罗夫与所谓“肃慎”人的沉默贸易,发生了间接的关系。按照中国史籍中肃慎与靺鞨之间的承继关系,以及它们在日本正史中音训上的相似,“靺鞨国”往往被视做北海道北部、东部,即所谓鄂霍茨克文化圈一带。^①

这一条史料还容易导致另一种解释,即渤海国的别称。因为此时,渤海建国已经20多年,并且这一时期的渤海,在唐朝常常因其部族名而被称做靺鞨。所以,这里的“靺鞨”似乎也不能排除是渤海的别称。果如此,则日本奈良朝廷派出使节的对象国似乎也可以指

^① 熊田亮介:《蝦夷与蝦狄——古代北方问题的记录》,载高桥富雄编《东北古代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159—221页;蓑岛荣纪:《阿倍比罗夫北征与东北亚世界》,载《日本古代的传承与东亚》,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483—537页。

渤海。^①当然,由于当时渤海对大多数靺鞨部尚未达成统一,所以此处的“靺鞨国”似乎还可能泛指渤海以及渤海领之外的其他靺鞨部。^②

《日本书纪》没有使用“靺鞨”,而是以“肃慎”统称大陆北方部族。《续日本纪》没有沿用“肃慎”旧称,而恢复了靺鞨的本来名称。这其中,除去含有史籍编纂者接收到的来自大陆的新信息外,从“靺鞨”到“肃慎”,可能也不是简单的替换,其所指代的地域也可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派往“靺鞨国”的诸君鞍南,其位阶是从七位上,这是非常低级的位阶。与此相对,728年,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团完成使命归国之际,日本政府派出从六位下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送渤海客使;740年,派出以从五位下大伴宿祢犬养为遣渤海使;758年,授予归国遣渤海大使小野朝臣田守从五位上,副使高桥朝臣老麻吕从五位下。此后日本派往渤海的使节团大使的官阶也均在六位以上。^③据此可以推断,此次出访的目的地不大可能是渤海。

727年(日本神龟四年),渤海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团之际,日本朝廷对渤海的记录是“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④。前者,即“渤海郡王使”,当是渤海使节对出羽的地方官的自我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渤海在与日本200多年的交往中,从未以“靺鞨国”自号过。后者“旧高丽国”当是

^① 鸟山喜一:《渤海史上諸問題》,风见书房1968年版,第232—234页;酒寄雅志:《8世紀日本外交与东亚情勢》,载《国史学》,103,1977年,后收入酒寄雅志著:《渤海与古代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版,第197—234页;新野直吉:《古代交易史上的日本海岸北部》,载《日本海地域史研究》二,1981年版,第1—28页;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徐德源等:《大钦茂王时期的渤日交往史事新探》,载《日本研究》1993年4期,第63—69页。

^② 平川南:《多贺城碑》,须藤隆等编辑《新版古代日本9东北·北海道》,角川书店1992年版,第231—232页。

^③ 以上均参见《续日本纪》卷一〇、卷一三、卷二一等有关记事。

^④ 参见《续日本纪》(卷一〇),圣武天皇神龟四年九月、十二月记事。

史官对渤海前史的追溯，其根据很可能是渤海使节递交给日本天皇的国书内容。^①如果720年诸君鞍男等为考察“风俗”而专程前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那就不至于约70年后，《类聚国史》^②才披露渤海建国初期的光景：“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668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朝所灭。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二年（698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713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如果“靺鞨国”就是渤海国，以上的情景，应是诸君鞍男受命观察风俗时就应当看到、并已为日本奈良朝廷所了解的。从这一处细节也可以看出，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处并不是渤海国。

在日本东北宫城县，有著名的日本三古碑之一的多贺城碑^③。多贺城建于神龟元年（724年），为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所建，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762年）。碑文刻记了多贺城的位置：“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仅仅从里数上看，“靺鞨国”不可能在北海道，以多贺城为中心展开3000里半径，则恰好可以到达大陆和库页岛地区。

《令集解》公式令“远方殊俗”条载：“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④“具序名号处所”所做的注释为：“穴云，名号，谓其国号也。假靺鞨也。处，谓海中、山中之类。”

“穴记”成书于延历十七年（798年）以前^⑤，正值渤海对日本遣

^① 《续日本纪》（卷一〇）天武天皇神龟五年（728年）春正月甲寅条：“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对此一段国书的分析，参见马一虹《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的有关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载《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第196—201页。

^② 《日本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

^③ 多贺城碑位于今宫城县仙台市仙台湾附近。

^④ 《令集解·公式令·集解》（卷三一），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版，吉川弘文馆。

^⑤ 石井正敏：《“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靺鞨国＝渤海说的研讨》，载《亚洲游学》3，特集东亚遣唐使，勉诚出版1999年版，注19。